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
• 大学之道丛书 •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

[美] 劳伦斯·维赛 (Laurence R. Veysey)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

[美] 劳伦斯·维赛 (Laurence R. Veysey) 著

栾莺 译

孙传钊 审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47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美)维赛(Veysey, L. R.)著;栾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

(北大高等教育文库·大学之道丛书)

ISBN 978-7-301-26443-0

I. ①美… II. ①维… ②栾…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2604号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 1965, 1993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美国现代大学的崛起

MEIGUO XIANDAI DAXUE DE JUEQI

著作责任者 [美] 劳伦斯·维赛著 栾鸢译 孙传钊 审校

丛书策划 周雁翎

丛书主持 周志刚

责任编辑 刘 军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4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0.5印张 440千字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言



美国大学形成时期最突出之处,就在于促进大学发展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思想的多样性。他们的故事激动人心之处即在于此。19世纪下半叶,学术界人士锋芒毕露,各执己见,尽管官方最终达成了共识,他们也绝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们营造出一个竞技场,其中充满着不断的争论、与根深蒂固的观点的激烈斗争,甚至充满着党同伐异和尖锐的人身攻击。绅士式的忠诚可能缓和了其激烈程度,却绝不可能使其完全屈服。虽然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仍然能谈论以特定结构为特点的“大学”,即使是统一化的强大趋势也无法抹杀学者们观点上的深刻差异,正是这些差异产生了学术流派。

美国学者,作为一个单一、标准的概念,在人们试图研究他们时就消失了。不幸的是,人们过于忽视美国内战之后几十年间学术争论的深度。一方面,将美国大学史分解成单个大学的编年史总是模糊了更为广泛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些问题使得学者们卓尔不群。虽然无可否认,像康奈尔、哈佛和哥伦比亚都有其独特的忠诚和传统,但是,这些大学之间的联系与导致学术紧张的更基本的原因几

乎没有共同点。当人们把这几所大学看作是由“一个”机构,而不是由一系列独立的企业构成的,当人们发现这些大学的代言人演讲的对象是全国的学者而非各自特定的群体,他们的差异就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另一方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一般态度总是走向另一极端。为了让人们容易理解,这些编年史运用涵盖很广的分析单位,从而没有余地探讨其他问题,例如,教职员工兴趣的多样化。虽然更透彻的地方性研究和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完善的总结,提供了关于美国学术组织的不可或缺的宝贵信息,但是这两者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它们都忽视了划分中等规模的群体——规模上介于单个学院和全国“教职员”之间。

19 世纪下半叶两个最重要的学术冲突在于两个议题:新大学的基本目的和学院的领导层对学院控制的类型和程度。从内战时期到 1890 年期间,前一个问题占据主要地位。在这前半期,人们在学术上的倾向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教育体系。讨论的中心是界定大学的性质和功能,多为抽象的概念。然后,随着学院采取严厉的行政政策,各个派系出现,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争论的重点转向对学院管理的关注。决定美国高等教育基本方向的斗争首先是竞争学术目标,继而针对学院的管理问题。其他类型的冲突也不应该被忽略,其中一些在随后的分析中会占据相当显著的地位。但是其他冲突涉及类似团体之间的竞争,谁输谁赢并无不同。

因此,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逐一讨论 1865 年后几十年间的主要学术思想体系,这些体系在此期间相互竞争,以求能占据美国高等教育的主导地位。描述这些思想体系时,还穿插有对于个别领军人物的简单分析,这些领军人物或多或少与某种思想体系有所关联。下编主要涉及 1890 年后的发展状况,描述了逐步形成的学院结构、新一代的学院管理者,及其对于各具气质的教授的影响。本



书也简单讨论了一些特别的领军人物,以说明上述主题。

正如本书上、下编所描述的,美国大学的发展过程基本分裂成两个时期,要求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前者要求理性的历史的方法,后者则要求非正式的结构—功能分析法。不幸的是,这些方法一方面受到人性的偏见所累,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科学的偏见所累——在解释一系列特定事件时,它们通常是互相抵触而非相辅相成的。学术保守派,包括很多历史学家,强调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人类高贵一面的正规的观念,而社会学家则看重那些影响学院的非自觉行为。人类无法一直进行抽象思维,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人类思维的全部——内心深处的冲动以及出于礼貌而表现出来的一面——都渴望得到认同。因此,大学就应该理解为吸引情感的磁场,而不仅仅是主观意识的产物。

本书致力于探讨各种有思想的人及其所处学院之间的联系,试图说明新大学的官员理想中的大学,通过比较,至少是部分比较的方法,评价大学最终的形态。本书不关注 19 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成果,而关注对其学术机构的思索。我要再次声明,拙著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部学院管理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关于学院管理的观念史。本书以学术界为核心,而不是以那个年代最热门、最著名的教授级人物为核心,除非他们对于学术界问题表现出兴趣。这就是这一研究在范围上的粗略界定。其他一些重要的相关问题也超出了这一研究范畴。本研究既不能详细描述单个学院的发展,也不能研讨学术原则。如果要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些学术原则,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写成与拙著同样厚度的论著。此外,我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省略迷人、独特的大学生活。在本书下编的某一章节中简单讨论了学生的行为,但也仅仅是为了说明学生的价值观对于学院整体的影响。最后,本书无法探讨关于大学的非学术观



点(大学高级管理人员的观点也属于此类)。这仅仅是对某个学院的全职参与者的研究,虽然也包含了这些参与者对于大众情绪的反应,但是无法追究其渊源。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学和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我关注的真正重点。这种关系具有最深刻的矛盾,似乎是令人极度困惑的。大学是一项非凡的成就。有些人甚至推测,在当前这个高度强调技能的时代,大学很快就会像 300 年前的教堂一样,成为美国的标志性机构。另一方面,自从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较好的大学校园一直保持了其作为庇护所的特性:在本质问题上,脱离于世俗,经常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在美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对其功能的两种相反的而同样精准的定义,在本书中,我就是尝试说明这一发展过程。

目 录



导论 学术改革的兴起 / 1

上编 高等教育的不同观念:1865—1910

第一章 智力训练和宗教虔诚 / 19

智力天赋心理学 / 20

关于上帝和人的传统观点 / 24

作为训练基地的学院 / 32

对精神特许的虚伪的反对 / 40

失败 / 51

第二章 实用 / 58

目标、学院和系部 / 58

“真实生活”的概念 / 62

宽宏、崇高的改革精神 / 70

对实用的两种见解:康奈尔和哈佛 / 84

地区性差异扩大 / 102



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效率” / 118

实用主义的高潮 / 123

第三章 研究 / 126

纯科学 / 127

德国大学的魅力 / 131

研究的倾向 / 139

科学信仰的类别 / 155

促进制度化的研究 / 165

正在发展的科学主义的标准 / 181

第四章 自由文化 / 188

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 / 188

“文化”的定义 / 192

寻求全面发展的人 / 207

宗教、灵感和知识 / 213

文化和美国社会 / 223

才华横溢的语言：教室里的人文学科 / 233

自由文化和学术领导权 / 247

重新评估的时期：1908—1910 / 267

下编 结构的代价：1890—1910

第五章 新大学的模式 / 277

90 年代初的学术繁荣 / 278

本科生的思想 / 283

学生和教师之间的鸿沟 / 311



管理的兴起 / 320

职业、管辖领域和学术帝国：荣誉之争 / 335

凝聚力的来源 / 350

具体化的迹象 / 356

第六章 融合协调的趋势 / 360

理念的逐渐融合 / 360

教育机构的商业模式 / 364

新时代的学术标准 / 374

“新”管理者的多样化 / 379

第七章 不协调的问题 / 401

学术自由：希望和僵局 / 404

对天才和创造性怪癖行为的反应 / 440

理想主义者的哀叹 / 457

结语：作为美国机构的大学 / 463

导论 学术改革的兴起



对于经历了 1870 年的人来说,1870 年前后可以看作“美国教育史的新纪元”。耶鲁大学的校长诺亚·伯特(Noah Porter)以怀疑论者的眼光见证了飞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在 1871 年对美国高等教育做出以下评论:

这一课题从来没有吸引如此多的人进行如此热切的思考。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它(高等教育)激发了有史以来最为积极的争论,引起最多样化或是自信的批评,经历了最多的试验。引导公众观点的人们的思想是如此易变,对于旧的方法和学习或真或假的缺陷的批评是如此尖锐,要求进行彻底的根本变革的决心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经常评论说,学院和大学教育不仅仅是被改革所改变,而且是被革命所震撼。

在描述内战之后几十年间促成美国大学的这场运动时,并非人人都同意伯特所使用的“革命”一词。学术改革者一再坚持,他们信奉渐进的变化,追求“进步”与“保守”的平衡。到世纪之交,虽然大学的入学人数似乎急剧增加,给人前所未有的扩张的印象,但是从



1900 到 1910 的十年间,美国适龄人群进入大学的比例仅仅从 4.01% 上升到 4.84%。这些数据相对于同期的商业销售量是太微不足道了。

然而也存在这一事实:与 1860 年的学院相比,1900 年的大学已经是面目全非了。无论从何种指标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本性质都改变了。学术方面,大学的目标正在孕育,而 19 世纪中期的学术管理者们对于这些目标仅仅有所警觉。与大学的复杂性相比,过去的学院就像是中小学。这一过渡时期也形成了非常看重自身地位的专职人员,取代了原先绅士化的业余人群。1865 年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生活中历史悠久的部分也在很多层面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一变化有着明显的连续因素,但是与学术改革新生并且快速生效的影响力相比,1865 年的学院就显得陈旧过时了。

当时存在诸多新的条件。如果给它们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亲欧派对现状的不满、可利用的国家财富以及对于学院影响力下降的及时警觉。大学首先是西欧的杰出创造。由于欧式文化活动的对外传播,大学最终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美国和日本,建立起来。这一事实是 19 世纪末期美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基础。美国形成了学术领导群体,他们渴望得到像在欧洲一样的平等地位,但是同时又强调要与外国标准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一领导群体渴望形成“本国性”的进步,但是每当改进中需要明确定义,他们还是将目光转向大西洋的东岸。随着 19 世纪的推进,在美国教育界的少数人中,阻碍人们接受欧洲学术形式的道德、宗教、政治方面的顾忌逐渐减弱。这一领导群体从传统的福音式虔诚中独立出来,抛弃了杰克逊式的粗俗,开始接受欧洲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以对抗社会上明显的流于粗俗的趋势。同时,才能无用武之地,要求无处宣泄,使得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愤愤不平,心怀不满。他们在欧洲看见了自己所想要的一



切。要满足这些人的社会理想主义、个人野心以及面对欧洲最大的成就方面不甘落后的美国式自负,在欧洲大陆新兴的神圣的大学是唯一的途径。

从这一角度来看,1865 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大学在美国落地生根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如果没有更具体的支持,这样的抱负很可能一事无成。首先要坦率承认一个事实:不久前才得到充足的资金。美国学院教育领域早期的革新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资金支持。美国的学院和大学长期依赖公共或私人的慈善捐款。在内战之后的年代,如果没有康奈尔、霍普金斯、洛克菲勒家族,如果没有密歇根、威斯康星的纳税人,大学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

再次重申,财富是学术变革的必要前提,但是并非充分原因。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教室,也可以用来购买城堡。要把这些钱用于学术改革,就必须有更进一步的动机。教育必须得到有钱人——至少是一部分有钱人——的重视。人们很容易夸大 19 世纪中叶美国人对教育的热情,尤其是在社会高层中。那个时期的实用主义者通常蔑视“无用”的书本。人们经常忽略一个事实:1890 年前的两位主要学术捐赠者——伊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和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都是贵格教徒,其动机是高度的博爱精神,这一年之后,对于高等教育的捐助才流行起来。然而学院仍然是值得尊敬的象征,大学作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有望对高等教育加以改进,使之更贴近实用主义者和有钱人的共同思维模式。学术改革于是就带来一种希望:既能挽救古老的神学思想,又要将其改变成更符合新的世俗需要的机构。教育逐渐成为物质成功的同义词,这一过程开始虽然缓慢,后来就越来越快,最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人的经济支持对于教育的扩大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大学在 1890 年前的发展主要依赖国家财富中的涓涓细流,但是这一涓涓细



流足够带来巨大的收获。

如果不是当时存在的学院面临困境,不论是财富还是想要追赶欧洲成就的愿望都不可能在美國高等教育中引发改革。事实上,已经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学院,当时正陷入更加严峻的困境。自从杰克逊时代起,虽然美国人口不断增加,学院的入学人数却保持不变。1865 年之后的几年,这些令人沮丧的数据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19 世纪 70 年代,全国的人口增加了 23%,但是 20 所“最古老的主要学院”的入学人数只增加了 3.5%。1885 年,美国全体议员中约四分之一是学院毕业生,而十年前这一比例是 38%。密歇根大学的查尔斯·坎德尔·亚当斯(Charles Kendall Adams)宣称:“长期以来被认为完成学业必需的培训已经日益失去人民的欢心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些不利的数据只代表着虚假的警报。全国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欧洲移民,而欧洲移民即使到了适学年龄,也是没有资格进入学院的。同理,19 世纪 80 年代,美国适龄人口上学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一因素当然不能解释所有现象。1890 年之后,移民的数量更多了,但是学院的入学人数开始稳步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美国高等教育停滞不前反映了信教人群偏好的变化。

在此之前,提供古典培训课程的学院仍然是确保人们取得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的途径。现在,很多年轻人,例如,学院毕业生的弟弟们,一度相信,只要努力经商或是从业,就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回报。(19 世纪末,具有学院学位的律师和医生人数下降了。)大城市的兴起也改变了人们对于职业的期望。人们能够想象的最杰出的职业不再是小镇的医生、律师、牧师。对于原本满足于成为乡村牧师的人,从商的可能性使他们蠢蠢欲动。这样,学院就失去了潜在



的学生。正如威廉姆斯的教授 T. H. 萨福德 (T. H. Safford) 于 1888 年所说:“城市生活的吸引抑制了很多孩子追求学问的热情,他们看到学长们面临着多种多样的职业选择,于是更愿意选择商业课程而非古典课程。”佛蒙特 (Vermont) 大学的管理者也赞同这一观点,1871 年,他们指出,由于“铁路和电报将我们与大城市紧密联系起来”,导致商业精神兴起,这是三十年来入学人数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学院如果不改变,它们在城市化、“物质化”的社会中的影响力必定越来越弱。

19 世纪中叶,学院在非统计领域表现出的影响力减弱可能才是最关键的。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证据反复说明一个事实:美国学院毕业生无形的荣誉正在逐渐衰落。1863 年,马萨诸塞州的农村孩子 G. 斯坦利·霍尔 (G. Stanley Hall), 被威廉姆斯学院录取,他试图向自己的乡下伙伴隐瞒这件事,“但是他们还是知道了,并且无情地嘲笑我”,他回忆道。这一事件反映出,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也是不确定的。杰克逊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学院被看作是代表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美国的文学学士构成了“教育界的贵族”。圈内人士可以很轻松地谈论古典培训“固有的体面”。但是与全国相比,他们只是少数派,而且也不像以前那么受人尊敬了。至于学院教授,他像东部的贵族一样受人尊重,但是却位于这一阶层的最底层。他缺乏律师或者牧师这样显著的职业地位具有的怡然自得。他也许要等待很多年才能等到一个空缺,然后他有可能得到这个空缺,但是不是因为人们承认他的学术才能,而是因为偶尔的社交联系(或者对于宗教的忠诚)。直到 1870 年,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 (William Graham Sumner) 抱怨说:“耶鲁没有所谓的学术职业。也没有为那些受到感召从事这份工作,并且愿意继续这份工作的人开设课程。”一旦得到一份任命,

教授往往需要另辟财源来弥补微薄的薪水。他的职责也非常单调：聆听学生用古代语言进行背诵并且打分，或者就是数学。哈佛的校长艾略特(Eliot)在1869年的就职演讲中说道：“很难为大学找到称职的教授。美国杰出人才中只有极少数才被这一职业吸引。工资太低，工作单调乏味，又不像其他学术职业那样能够得到逐步提升。”名门望族通常鄙视教授。这个时期的教授拿着微薄的薪水，承担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只能附骥于日渐没落的新英格兰传统。

1865年，最著名的学院的院长中，很多是老人，其中十之八九是神职人员。威廉姆斯学院的院长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于1836年就职，一直到1872年才离任。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赛(Theodore Dwight Woolsey)于1823年首次执教耶鲁，一直到1871年才退休。威廉·A.斯特恩斯(William A. Stearns)在19世纪20年代曾是哈佛一位非常虔诚的学生，他担任阿姆赫斯特(Amherst)的院长直至1876年。这些人对于60年代末的挑战表现得很谨慎。马克·霍普金斯很坦率地反对学术扩张。他在1872年宣称：“在书本和物质的积累、大量的教师能给予学生的好处方面，存在一种错误的印象。”霍普金斯的一位追随者评价说：“他不急于用新书来替换旧书。”认识阿姆赫斯特的院长斯特恩斯的人说，他在教育、政治和神学问题上都是温和的保守派。在哲学上斯特恩斯倾向于苏格兰的常识而反对“德国的浓雾”。他担心，在课程中增加太多的文学和思想内容会把阿姆赫斯特变成“泛神论的摇篮”。他要传授给学生的是“对长者的尊敬，对父母、神圣机构、智慧和善良的敬畏”。作为教师，斯特恩斯与学生保持着距离，被认为既缺乏热情，也缺乏感染力。

在所有学院中，耶鲁和哈佛是最卓越的，这两所学院的院长比大多数院长更机敏。但是人们也很容易夸大他们对变革的热情。



耶鲁学院的伍尔赛(Woolsey)曾在德国研究古典语言学。但是回国后,他强调玄学的教学,因此,他只介绍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哲学家,而不提及康德和黑格尔。在伍尔赛执掌耶鲁的漫长时期,纽黑文的科学、历史和经济学都倒退了。伍尔赛的教书风格也可以归为“令人生畏、难以亲近”。哈佛的院长托马斯·希尔(Thomas Hill)是自学成才的。这一事实使他与社会格格不入(曾有人指责他在公共场合脱下鞋子,取出里面的小石子),也许正因如此,他对教育革新比较开明。希尔喜欢构想包含人类所有知识的宏伟而抽象的教学方案。但是他也明确表示对思维培训“应该严格监控和引导”,以便哈佛的年轻人可以“体味简单而精纯的快乐”。他主张,学院必须更谨慎地使自主教育免受就业主义的影响。虽然希尔渴望改革,但是没有支持改革的性格力量,因此总是不温不火。他于1868年因病辞职。

1865年美国大多数学院的领导者就是这样。他们要么反对改革,要么对改革模棱两可,心不在焉。所以,美国重建运动(Reconstruction)前夕,在对美国状况加以评估时,人们经常忽略学院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学院的管理者们大多接受了费舍尔·艾姆斯(Fisher Ames)和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的理论。对他们而言,内战也许解决了一系列重要而麻烦的政治问题,对于社会、宗教和求学的基本原理的既定信仰,内战并没有创造改变的环境。在一个动荡不安、文化水平不高的国家,这些院长和教职员工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他们也并不都希望引起公众的关注。他们将学院支持下降的原因归咎为一些暂时的特殊情况,或者是区域性问题,如:战争的干扰,同类学院的竞争,财政困难,中学的衰落,党派之争以及更高的入学标准。这些人能够提出的唯一对策就是坚持,或许在细节上做出一些让步,希望他们的学院能够生存下去。这些